

上海文博

SHANGHAI WENBO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 上海辞书出版社

论丛

2004.3



9 787532 616961 >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顾问、上海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于2004年9月25日20时25分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7岁。

马承源先生学生时代即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5月入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1948年9月因白色恐怖，撤往苏北革命根据地。

上世纪50年代，马承源先生开始从事中国古代青铜器、古文字学研究，是国内外著名的专家。50多年来，马承源先生致力于上海市的文物、博物馆事业，特别是倡议与主持了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建设，使上海博物馆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为上海的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马承源先生曾积极征集和挽救了无数文物珍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境外挽救了近300余种重要文物回归祖国。

马承源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国青铜器全集》等重要学术著作数百万字，在海内外博物馆享有重大影响。近几年来，马承源先生不顾年老多病，仍一如既往坚持埋首学术研究，期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为中外学术界所震惊。

马承源先生曾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共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6年获美国亚洲文化委员会洛克菲洛奖、1998年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2000年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64 书苑猎真 (撰文 / 丁辑)

申城史地 shenchengshidi

- 66 血洒疆场 浩气长存——淞沪抗战历史遗迹考略（撰文／谭玉峰 陈平）
 73 读名著话名园——计成《园冶》与松江颐园之互论（撰文、摄影／林子权）
 77 徐光启故居溯源（撰文／王成义）
 78 老上海金市——从金业公所到金业交易所（撰文／傅为群）
 81 格致书院大铁房博物馆筹建始末（撰文／吕建昌）

滴水片石 dīshuǐpiànshí

- 84 兼巢老人沈卫（撰文／陈左高）
 86 上海求援记——为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撰文／侯良）
 90 四十年前印精品——回忆为上海博物馆制版的一段经历（撰文／徐志放）

上海博览 shanghaibolan

- 92 文保单位（六）（撰文／胡学群）

资讯链接 zixunlianjie

- 94 “上海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展”在巴塞罗那举行（撰文／秦彤）
 94 国内首家隧道科技馆在上海开馆（本刊报道）
 95 中国烟草博物馆落成开放（本刊报道）
 95 上海铁路博物馆开馆（本刊报道）
 95 南汇博物馆即将面世（撰文／王树华）
 96 “金山卫城南门侵华日军登陆地点”修缮工程论证会在金山举行（撰文／黄亦男）
 96 “雷锋杯”全国博物馆讲解比赛在抚顺举行（本刊报道）
 96 《松江文物保护单位图文集》正式出版（撰文／晓月）
 96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再次来沪展出（撰文／李柏华）



Contents

Essay on Cultural Relics

Mourning with Deep Grief for Mr. Ma Chengyuan (text by Chen Xiejun)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Ink-stone (text by Liu Xinyuan)

New look of the Relics

Inscriptions on Excavated Ink-stones of the Song, Liao and Jin Dynasties (text by Hua Cixiang)

A Probably Misunderstood Religious Phenomenon (text by Zhang Minghua)

Doorway Decorations in the Song Paintings (text by Chen Qing)

Research on Letters Written by Liu Chenggan to Li Xiang (text by She Yanyan)

Excavation Report

Pendants on Mantelins Excavated in Shanghai (text by He Jiying)

Appreciation of Masterpieces

A Few Agricultural Tax Notes of the Qing Dynasty (text by Xue Liyong)

Chinese Paper Currency Samples Printed by American Banknote Corporation (text by Fan Yonglin)

Paper Bills Valued Fifty Copper Coins Issued by Official Banks of the Qing Royal Hunting Field

(text by Zhou Xiang)

Talk on Paper-Cut (text by Zhang Qingyun)

Museum Forum

Theoretic Deliberation upon the Display Design of Museums (text by Chen Xiejun)

Basic Ideas in Display Design (text by Li Rongrong)

The Unification of Structure Science and Art Form (text / drawn by Hou Li)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s' Information Technique (text by Liu Jian)

News from Overseas

Digital Watch-Museums' Websites Should Be More Than Databases

(text by Klavs Muller / translated by Zhou Yanqun)



Book Review

Book Selections (text by Ding Ji)



Historic Geography of Shanghai

Historic Sit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Shanghai (text by Tan Yufeng and Chen Ping)

The Work *Yuan Ye* Written by Ji Cheng and the Yiyuan Garden in Songjiang (text / photos by Lin Ziquan)

Trace to Residence of Xu Guangqi (text by Wang Chengyi)

Gold Market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Years from 1920s to 1930s (text by Fu Weiqun)

Story about the Preparation to Construct the Museum of Gezhil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text by Lu Jianchang)

Miscellaneous Column

Shen Wei: An Old Scholar I Known (text by Chen Zuogao)

Support from Shanghai during the Excavation of Ma Wang Dui Tombs (text by Hou Liang)

An Experience of Reproducing Painting Masterpieces for Shanghai Museum (text by Xu Zhifang)



Explosion of Shanghai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Relic Preservation Institutes (6) (text by Hu Xuequn)

Updated Information Link

Exhibition of Bronzes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Held in Barcelona

The First Gallery of Tunn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pening in Shanghai

Completion and open of China Tobacco Museum

Shanghai Railway Museum Opens

Nanhui Museum Will Show to the Public

A Demonstration on Repairing Project of the Japanese Troops Landing Site at Weicheng Held in Jinshan District

Leifeng Cup Explication Competition among Chinese Museums Held in Fushun

Catalogue of Cultural Relic Preservation Institutes in Songjiang Published

Another Group of Statues of Buddhism from Longxing Temple in Qingzhou on Display in Shanghai



仰视长天寻艺程

——沉痛悼念马承源先生

Mourning with Deep Grief for Mr. Ma Chengyuan

撰文 / 陈燮君

马承源先生因病不幸逝世，离我们而去。

这些天来，上海博物馆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与缅怀之中，我们沉痛地经历着没有老馆长的日子。

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驻足于马先生钟爱的大克鼎、牺尊、晋侯稣钟、吴王夫差盃前，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由晋侯稣钟演奏的古乐《阳关三叠》，寻觅着马馆长鉴定和观赏青铜文物时那种欣喜、坚毅、求索的目光。我一回又一回地走进人民广场，停留于水珠腾跃的中央喷泉旁，置身于晚风荡漾起的乐曲声中，眺望上海博物馆新馆的晶莹、璀璨，此时，耳旁又响起了马先生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前关于新建上海博物馆的誓言，眼前显现老馆长手举望远镜，寻找出日本施工人员拼接外墙花岗石贴面误差一个多毫米的情景……

不，马先生没有离我们而去。几天前，马先生与我在馆内相遇，他还高兴地告诉我，第四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校样已完成，即将出版。一周前，在文管委系统的大会上，我还深情地介绍了法国总统希拉克与马先生的友情，希望大家以更大的作为，进一步赢得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在老领导、老专家们创造出的业绩之基础上，再创新的辉煌。十来天前，我在向国家文物局有关课题组介绍上海博物馆经验时，还反复诉说着老先生带领上海博物馆走进事业的新成长期。马先生和老一辈馆领导及专家们不懈努力，使上海文物与博物馆几代人平

凡的人生铸就了上海城市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不平凡年轮，使上海博物馆的各个展览更具视觉冲击力、历史穿透力和文化震撼力；使现代文物与博物馆理念、审美意识、史学视野和人文关怀更好地接纳千百年来春风秋阳一路呵护而来的智慧、经典、悲壮和铿锵；使普通市民、学生密集地走进上海博物馆，徜徉于古代艺术殿堂，在赞叹人类古文明的同时，赏我中华文物，爱我中华人文，扬我中华文化，壮我中华精神。

马承源先生为浙江镇海人，生于1927年11月，学生时代即投身革命。1954年12月到上海博物馆工作，从此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在上海博物馆期间，他先后担任党支部委员、党支部书记、保管部副主任、陈列研究部副主任、青铜器研究部主任，1985年3月起任上海博物馆馆长，1988年10月起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9年3月起任上海市文管委顾问、上海博物馆顾问。他曾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198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荣获美国亚洲文化委员会授予的洛克菲勒奖，1998年荣获法兰西共和国国家（荣誉）军团勋章，2000年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半个世纪以来,马先生以他的文博胆略,与同事一起,奠定了上海博物馆发展的较高逻辑起点;马先生以他的学术胆识,与同仁一起,确立了上海博物馆与世界各大博物馆从容对话的学术地位;马先生以他的人文豪气,与同仁一起,提升着上海博物馆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马先生以他的文化睿智,与同行一起,绵延着上海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壮丽史诗。马先生是中国文物与博物馆界的泰斗式人物,他的逝世无疑是中国文物与博物馆界的重大损失。

马先生默默地走了,他留下了永恒的理念,这就是传承文明,养育文化,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目标一流、严字当头,自我加压,自我超越;他留下了进击的意识,那就是与时俱进的战略意识,坚韧不拔的胆略意识,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练好内功的管理意识,大局下面的细节意识;他留下了永远的敬业,那就是以世界领先为高度的敬业,以时代发展为进度的敬业,以学术希冀为深度的敬业,以生命存在为长度的敬业;他留下了不懈的勤勉,那就是一路好学的勤勉,提升学术的勤勉,开拓创新的勤勉,笔耕不辍的勤勉。

不断创新的睿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先生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后,立即领导了陈列室的改造,完成了青铜、陶瓷、书画、雕塑四个陈列室的改建和钱币馆的新建,在全国同行中颇受瞩目。马先生最成功的创新思维随着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兴建而展开,在他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上海一些老同志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市领导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建设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决策。1993年8月,上海博物馆新馆建设工程在人民广场南端开工。马先生与设计师共商大计,把新馆的设计思路定为“历史—未来”,“传统—现代”,“民族性—世界性”,在建筑语言上推陈出新,追求功能与形式的统一、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技术与艺术的融会,使上海博物馆成为城市最重要的文化窗口之一,使中国博物馆的现代化步伐率先在东海之滨迈开。创新与睿智

还表现在建筑设计的整体理念,陈列室的空间布局,博物馆基本功能的现代化推进上,反映在空间营造的整体性、硬件软件的互补性、设备设施的先进性的积极运筹上,体现在外墙贴面的西班牙花岗岩,大厅内墙贴面的印度砂石,地面装饰的沙特阿拉伯大理石的精心挑选上,融会在大堂的装



修、每个陈列馆的基本色调的互异、门外石雕和门环纹饰的悉心选择上。在改革思路中也融进了创新的睿智,在体制上引进专业化、社会化管理,冲击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在机制上实行行政和业务分流管理,行政部门率先实行聘任制,双向选择,择优录用;在分配上打破平均主义,奖励和岗位责任、工作实绩挂钩;在制度上按现代化博物馆要求制订规章……局部之中见创新,局部的创新反映了整体思路的创新;过程之中见创新,过程的创新保证了动态推动的创新;细微之中见创新,细节的创新是创新睿智的另一种时空定格!

不遗余力的“呵护”

马先生对文物的“呵护”不遗余力，对国宝的抢救坚持不懈。在马先生和同事们的全力抢救下，上海博物馆已先后抢救回归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石刻造像以及丝织品等各类文物珍品300余件，其中就有晋侯稣钟、吴王夫差盃、战国楚竹书等国之瑰宝。战国楚竹书的抢救入藏和经典解读，充分反映了马先生对于稀世文物的不懈“呵护”。

1994年春，香港市场悄然出现竹简，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张光裕教授迅速把信息传递给上海博物馆，并电传过来一批摹本，由此拉开了战国楚竹书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序幕。事后马承源先生深情地回忆说：从当时电传过来的摹本看，有几支是《周易》中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些不知篇名的有关文王和周公的内容。从以后几次电传的摹本中进一步了解到，这些竹简文字估计多是尚未知晓的先秦古籍，简文字体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相一致。信息往来，当断则断，马先生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出资收购。5月，这批竹简顺利送抵上海博物馆。同年秋冬之际，相关竹简又一次在香港出现，并由在香港的上海博物馆之友，包括朱吕言、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麟和叶昌午等先生联合出资收购、捐赠。

从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之日起，就有文化震撼之下的一种殷殷文化关怀和不懈的文化“呵护”。这种文化“呵护”继续涵盖于楚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上海博物馆的科研人员在竹简保护中调遣了力量，迸发了智慧，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又在排忧解难中磨砺了队伍。收藏竹简的最大难题是“脱水保护”。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的专题研究组经过近三年时间的艰苦探索，圆满完成了“饱水竹简性质及真空冷冻干燥研究”课题，探索出了一种脱水加固定型法，对1200余枚严重腐朽的竹简进行脱水定型处理，去除污色，处理后的竹简强度提高，色泽自然。这是我国出土饱水竹简大批量脱水保护的首例，在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找到了较大规模处理严重腐朽饱水竹简的有效保护途径。接着，专家学者们

又遇到了另外两大难题。一为“简文识读”。经过年代测定，这些竹简的时代均为战国晚期，竹简文字中所涉及的史事多与楚国有关，有的是楚国的文学作品，简文字体为楚国文字，不易识读出来。楚简文字为战国时的东土一系，即六国文字，秦统一后被废除，汉晋时辨识六国文字已属难事，今人更感不易。“简文识读”中的难点的一一攻克，为战国楚竹书的整理研究拓展了通途。二为“依序排简”。竹简共达1200余枚，为“劫余截归”，多为残简，排序谈何容易。竹简分批抵沪，有的在购置时已经分散。“劫余”加“流散”，无疑为排简工作增添了新的难度。在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依序排简”工作不断推进与完善，保证了整个学术工程的顺利进展。

这批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重大价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学术意义。战国楚竹书的简文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所涉及书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传为美谈。这些战国楚竹书共计达35000字，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在已出土楚简中占有较大比重，实为难得，对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音乐史等产生深刻影响。这些战国楚竹书为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先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而其本身又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这批楚竹书近百种，其中能和业已流传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10种，足见发现其独特的意义和重大的价值。

不知疲倦的勤勉

马先生一生勤奋，著作等身。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更是独树一帜，硕果累累。他撰写并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中国古代青铜器》、《青铜礼器》、《中国青铜器研究》等学术专著；主编有《商周青铜器铭文

选》、《中国青铜器》、《中国文物精华大词典·青铜卷》和十六册之巨的《中国青铜器全集》、四卷本的《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等。其中,《中国古代青铜器》曾被牛津大学译成英文,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文物教材《中国青铜器》已成为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课本;《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收集中国历代青铜器1300多件,影响甚广;十六册《中国青铜器全集》被誉为是20世纪以来最为完整、系统、权威的青铜器图录研究大全。

马先生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有《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何尊铭文初释》、《商周青铜双音钟》、《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关于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问题的探讨》、《晋侯稣编钟》、《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等。在马先生的论著中,就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分期断代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史实,乃至铸造、修复、鉴定等都提出了论断科学合理、见解新颖独到并充满睿智的思考,形成了具有自己学术个性并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体系。

马先生对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做出科学划分,即划为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和衰退期。关于商和西周的金文、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问题、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问题、何尊铭文、德方鼎铭文、小臣单觶、晋侯稣编钟、商周青铜器纹饰、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吴越文化青铜器、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商周青铜双音钟、新莽无射律管对黄钟十二律研究的启示、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等,马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具有理论突破,在国内外文物与博物馆界引起高度重视和赞赏。马先生孜孜不倦,勇于创新,不仅使自己的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使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研究水平处于该领域的前沿,为学术界所广泛瞩目。即使是从世界范围来说,马先生的青铜研究也是首屈一指。

“不惜自我”的超越

马先生的与时俱进还表现为自我加压,不断地超越自我。2002年12月21日,正值上海博物馆50大庆之日,马先生和我从北京开会返沪,在北京机场候机时。马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上海博物馆建馆已整整半个世纪。新馆开馆也已有六、七年了。上海博物馆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于不断拓展,不断地自我加压,包括超越“自我”,发展“自我”。如上海博物馆新馆的陈列专馆,虽然几年过去了,大家的反映依然很好,但我们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抓紧做出计划,及时地相继改建。回沪后,我们在原有陈列专馆更新调整的基础上,加快了推进步伐。自我加压,我们进一步加快了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研究、教育三大功能的现代化步伐;我们形成了办大展的“三大思路”,即走近人类古代文明、努力展示我国边远省份和文物大省的文物精品以及举办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大展;我们顺利完成了上海博物馆报告厅和南汇文物保护基地的建设;我们进一步注重文物保管、安全防范和传统、科技修复;我们加强了基础业务管理和学术研究的力度,积极推进“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工程;我们成功完成了信息化三期工程;“人才培养、人事制度改革”工程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正在走向“人才培养”的深层,推出新的人才培养举措,打造一流文物与博物馆队伍,尤其是加快鉴定人才的培养。超越“自我”,需要科学发展观的引领;超越“自我”,需要新的视野的拓展;超越“自我”,需要不断增强超越能力。

马先生离我们远行。这次出门,将走得很远很远。哀思绵绵,作诗一首,以寄托我们的思念之情:

投身革命显刚毅,驰骋文博炼气质。

仰视长空寻艺程,苍茫深处见胆识。

大圆地方新馆起,春来秋往旧址移。

抢救瑰宝走南北,兴建圣殿贯东西。

追逐青铜觅重器,笑谈器形说工艺。

细辨纹饰和铭文,定夺断代与分期。

耕耘战国楚竹书,识读中华古文字。

三秦古月浦江银,西周旧文沪上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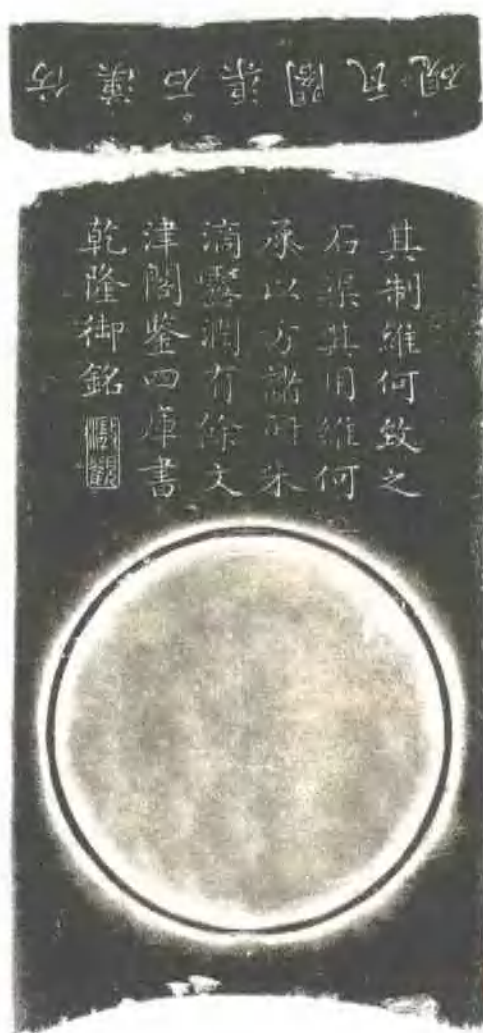
藏砚与读砚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Ink-stones

撰文 / 刘新园



清乾隆御铭歙砚及拓片



藏砚——庭前枯树忽着花，知是阳春到我家

我的父母过世很早。六旬祖母带着我和妹妹住在一间又大又破的房子里，一家三口靠祖母搭麻(用作渔网的材料)过活，不时还需要卖点家当补贴不足。

上世纪50年代初，当红军的叔父突然回来了。为减轻祖母的负担，把我带到了大城市念书。

两年后祖母病逝，叔父要我回家料理，我那又破又大的家比以前更破更空了。那时正值“大跃进”，大门上的铺首铁环、橱子上的金属吊件统统被敲掉，支援国家搞建设去了。房前的大树，后院的果木，也都贡献给大食堂当柴烧了。

几天后，一位远房亲戚告诉我：“你祖母病危时告诉过我，在三楼柜子里有一包东西是留给你的纪念品，让你带走。”临行前我含着眼泪爬上三楼，果然在破柜子里找到了一个蓝印花布的包袱，打开一看，净是大大小小的黑色漆盒或木盒，每个盒子里都有一方砚台。砚台花样很多，有的还刻了诗文。从诗文中知道，那是我曾祖父和祖父的遗物。祖母留给我这些可能有两重意思：一是希望多读书，要我明白自己是读书人的后代；二是这些东西的主人——我的祖辈都曾经风光过，显然祖母希望我也有辉煌的未来。我没见过我的祖辈，很难想象他们的音容笑貌，但我沉重



北宋枣心肩纹月样歙砚

地感到，这些砚台寄托了我祖母的一点点可怜的期望，我决心把它们带在身边。

我带着包袱回到南昌。叔父看见后大为惊讶：“你从家里带了那么大一包，里面都装些什么？”我把包袱打开，露出一方方砚台，叔父的脸上掠过一丝嘲讽地微笑，感叹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人人都用钢笔，谁还有时间磨墨写字？！这些东西没有用了！把它们放到储藏室去吧！”大概



清康熙江潘铭洮河砚拓片

是怕被叔父扔掉，我把大包塞进了我的铺下。

一个阴冷的冬天，我坐在窗前落泪。怀念我的祖母和我那空旷破落又令我依依不舍的家。于是我拖出包袱，随手拿出一个砚盒。砚盒上刻着“宋月形歙砚”，打开一看，是滋润的黑圆石一块。圆石上有道沿着外轮廓作成的窄边，再沿边作出依次向下的一个倾斜面，斜面的终点——砚池自然而然地形成一道弯月。也许是因为石头的光泽度极高，我随手移动，砚面斜坡深处的一弯月亮就会慢慢扩大。侧起则斜坡状的砚膛与砚池为一轮圆月，放平则砚边又成一弯新月。再看砚底，覆手内刻着“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矣。癸未录苏长公语，鹤皋镌”。

这是苏轼在《赤壁赋》中描写月亮的句子，我刚刚转动砚面时，确实实地感觉到了月影时圆时缺与时消时长。而平放案头时又没有了圆缺和消长。我佩服东坡描写大自然的才华，也佩服祖父十分贴切地把这两句话刻在月形砚上，渐渐我似乎朦胧地看到一位老者——我的祖父对砚沉思的样子。月形砚上的这一层含义是祖父的发现？还是宋代砚工的创意？抑或是砚工在《赤壁赋》的感召下，把东坡的哲理形象化了？其实，砚上的“月”如自然界的月一般，原本并无圆缺与盈亏，所谓圆缺盈亏者，只不过是看月人与赏砚人

因角度不同而产生的感觉罢了。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叔父去了东德，在大学念书的我得不到接济，因口粮一减再减，脸上出现了浮肿。挣不到钱的学生，只能硬是忍着，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位邻居，他是位医生，家境不错，又喜欢搞点收藏。于是我拿了一方砚给他看，他端详了一会儿，高兴地指着砚台说：“这是过了时的东西，对年轻人没有用，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然后抬起头问：“多少钱？”

“我没吃的了，你还是拿点吃的给我吧！”

这位医生很慷慨，他拿走了一方砚台给了我10斤红薯。以后，每当我腹内发热饥饿难熬时，我就会拿砚台给他。他换给我一叠叠食堂的饭票，或给点黄豆和莲藕之类。待叔父回国后，我的处境有了改善，可是从故乡带来的砚台，只剩下了一方，其他都离我而去。我失去的砚台，是否还有别的铭文，是否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再也记不清楚了。也许失去了就越发觉得它们的美好，我总忘不了那些砚台，感到它们和我前辈的密切关系；感到它们蕴藏着中国知识分子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独特的文化感觉；也确凿无疑地还蕴藏着我祖母的希望。每想到这些，我就会盘算着：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一定想办法把它们买回来，以缓解我的懊悔，填补我空虚的心。

毕业进入大学教书，我终于有了工资，每月省出一些闲钱，逛逛旧货市场找砚台，或者到朋友家去看看别人的藏砚，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嗜好。从1962年到1966年我又陆续买回了些砚台，加上从老家带出来的那方乾隆御铭砚，大约有了10来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来抄家，他们翻箱倒柜，把我的砚台碰破了不少，一方有紫檀盒的乾隆御铭砚，也被作为“四



北宋罗纹坑斧形歙砚



南宋歙石双厘砚

旧”没收了。

从那时起，我万念俱寂，再也没有兴趣看砚藏砚了。1986年婺源建立龙尾砚厂，我把惟一完好的一方王炳荣刻瓷砚送给了砚雕艺术家王润石先生。

1988年以后，全国都开放了文物市场。由于经常出差在外，朋友总喜欢邀我去逛各地的早市，为他们掌眼，买点小古董。有一天，在天津的地摊上看到一方似曾相识的砚台，我停下脚步定神一看，石料特殊，引起了我的注意：边线已经残破，砚面布满伤痕，不过砚额上的乾隆铭文尚可辨析。呀！这不是我在“文革”中失去的那方御铭砚吗？紫檀砚盒已不知去向，“面容”也憔悴如此，但我还是把它认出来了。看见它就像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忽然遇见儿时的伙伴，尽管岁月的风霜已使昔年的风华荡然无存，但我终于透过密集的皱纹还是依稀找到了旧时的模样。这方砚台就是我从湖南老家带出来的，竟然会在30年后、数千里外的天津见到。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了下来，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使我不能入睡。

我在辗转反侧中打开床前的台灯，翻阅《八指头陀诗集》中的一首绝句：“庭前枯树忽着花，知是阳春到我家。怀中满生新意思，青青草色上袈裟。”在我心中已经枯死了30多年的藏砚情结，

竟因见到旧物而复活了。对着这方布满伤痕的御铭砚，我异常兴奋，也无限感慨。

以后，我有机会访问台北和香港，在台北故宫看到了《西清砚谱》中的许多原件。在香港作为徐氏艺术馆的顾问，经常上摩罗街找古玩。香港的古玩铺除雕工考究的端砚比较昂贵外，出土的素砚没人要，价格也低廉，因而有机会买到过很精彩的唐、宋砚。1990年代初期，我应邀赴英国讲学，在伦敦认识了前国民政府驻英大员吴英先生，他在英国收到了多方砚台，由于西人没有兴趣，他很廉价地转让给了我。近20年来，虽然有机会接触较多的古砚，但我不买唐或唐宋以前的陶砚，因为我没有能力判定其真伪。

我重视有铭文的砚台，但不要大名家，特别是宋代大学者、大诗人的题名砚。尽管宋人喜欢作砚铭，我猜想那时很可能只写在纸上或者刻在砚匣之上，不一定像明清人那样刻在砚台上。因为宋代墓葬中有大量的砚台出土，很少刻有铭文。唐宋八大古文家之一的曾巩，在他的《南丰集》留下了与砚相关的文字（译《曾巩集·谢实录院赐砚纸笔墨表》，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本，771页），但从他的坟墓中发掘出来的竟是一方素面歙砚。

在我的藏品中有铭文的砚虽然不多，但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金石家的刻铭砚，因为他们有大量的作品传存，可与砚铭作对比来判别其真伪。另一类为铭文文词与书法均美，但作铭人却不见经传者。因为作者是无名之辈当不会有人假冒。比如有方江涪铭文的“洮河畔雍砚”，买到时并不知江涪为何许人，多年后阅读地方志，才知道他是康熙时代的学者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

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介绍得以认识孙皖平先生。孙先生是位脚踏实地的学者，曾经组织考察研究歙石产地——江西省婺源县龙尾山的古砚



南宋对眉纹歙砚

石矿”。有一天来九砚山房观砚，我喜出望外，把什么都翻出来请他过目。

他说：“你收藏的五代和宋代歙砚很精彩，你的鸂鶒砚、罗纹斧形砚是歙砚中神品。你的圆首凤字与枣心眉纹、水舷坑金花砚可能是歙砚中的孤例。”

我说：“未必有如此重要吧。”

“不瞒你说，我也非常喜欢歙砚，我的收藏也有一定的规模，但神品和孤品不如你的好。”他谦虚而感慨地说。

2004年上半年孙先生背了一个大包来我家作客，还没落座，就兴奋异常地说：“我手头有你这里缺的歙砚，我都给你带来，又取出小盒，撤掉包装纸，拿出一方方十分精彩的石砚。其中有唐代细罗纹垂裙凤字砚，南宋的对眉纹与雁湖眉纹砚。

“这么精彩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说。

“我想这是你欠缺而应当补上的。”他微笑着说，“因为你的精品比我的多，所以我把我最好的几方带过来送给您，希望您能接受。”

“这些都是极难见到的艺术品，我怎么有资格接受呢？”我十分不安地说。

“君子成人之美”他郑重其事的说，“我把这几方送给你，你的歙砚就会成系统。好东西集中在有识之士的手中，可看出名堂，好作研究，比四分五裂要好的多。”

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他，只能在这里记录下这段情深谊厚的对话。如果我的歙砚收藏算有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由孙先生帮助我建立起来的。

前不久，统计了一下我的藏砚，竟也达到60余方，时代在唐至清，品类凡端、歙、洮河和澄泥均有，于有便

将我的小书房定名为了“九砚山房”。

读砚——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喜欢买书。买书的目的是为了读书；我喜欢藏砚，但读砚的兴趣似乎比藏砚更大。每当夜深人静，我喜欢把我的砚台一方方摆在书桌上，比较造形上的差异，观察时代不同的石砚上呈现出来的不同纹理。这些和古代精英阶层距离最近（古人书写时和砚的距离只有40厘米），相处时间最长（因为砚在使用过程中磨损最少，所以古人谓“砚寿一世”）的文房用品，往往会向我诉说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有不同的审美情趣，而这些情趣又是任何文献都不曾记述过的。

我们阅读唐端砚，可知唐人不爱鸂鶒眼，被后代视为珍宝的鸂鶒眼，在唐砚上不是在极不重要的部位便是被任意铲掉。可见唐人追求的是一段纯净的紫玉，并不在乎石眼之类。歙砚眉子石上的眉纹被后代人视为珍异，唐人制砚时却要千方百计地回避，如果不能回避则把它放在覆手之内，与人视线接触最多的砚面上，是绝对不允许有眉纹的，可见唐人对歙砚的要求亦以玉作标准，他们希望歙石像一块无瑕的墨玉。由此可知，唐人追求的是砚石的纯净美，而不重视石上的斑纹。他们很可能认为：石上之斑纹为石中之瑕疵，正像玉石内的络纹为玉的瑕疵一样。

如果我们查考文献，特别是南宋文献，人们

谈论端石时津津乐道地记录鸂鶒眼的大小、位置、层次、颜色等。记录歙石时则对石头的纹理进行详尽的分类，眉纹石之石纹有9种，罗纹石之罗纹竟有13种之多，并且认为歙石以眉纹、罗纹、刷丝、金星为贵。

所以，端砚上的眼在北宋中期以后都做成突起的石柱，有的在取石时还特别把它放在砚额之上，名为“高眼”。宋代歙石上的眉纹、刷丝纹、古犀罗纹与金星、金花之类都必须放在砚面。可见宋人的审美标准和唐人不同。唐人重视材料的纯净美，而宋人则特别强调石料上的纹理美。他们不仅对石砚有这种要求，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比如宋徽宗艮岳中就安放许多有天然洞眼的太湖石，又如宋内府用于取暖的御炉木炭，必须要求有胡桃纹捣鸂鶒色（详《宋史·食货八》，中华书局标点本，4535页）。从常识上来说，石头上的洞眼，不一定是石质优异的标志，木炭上的胡桃纹也未必与木炭的发热量有关，当时持此标准显然只是出于审美的原因。

宋代歙石砚形从砚面到砚底由大到小依次收分，而砚唇作得极其规矩，与砚膛接近的一边起线为半刀泥（即一边深一边浅），从而使砚膛微微鼓起，下凹的墨池与凸起的砚膛形成美丽的对比。这样的造型显然是为了突出石材的质地美。工匠们再把砚底作成抄手，除有减轻重量的作用外，还有消除累赘追求简洁的目的。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简洁是天才的姊妹。”显然宋代歙砚的造型必然出自天才工匠之手。从以适用为前提，突出石材纹理与质地美这个角度上说，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比歙州石砚更成功的砚式呢？

一切技艺与一切风尚等到成熟后就会发生变化，有顺向的变化也有取得实效逆向变化。宋代歙州工匠把简洁的砚式推向极致，那么砚式就一定要发生变化了。然而，宋代以后的歙州制砚业因石料枯竭而停产，中国砚式的演变之地就不在歙州而转向端州了。

明、清时代的端砚式样繁多。花色新奇、雕

工精巧，广受社会欢迎。然而，“李杜诗本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瓯北诗抄》）雕工华美的明、清端砚在文房艺术品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审美天地，宋代的歙州砚式成为了过时的“简单”式样。宋代端州砚式曾受到过歙砚的影响，所以宋代文献有“端石歙样”之说。明、清时代偶尔一见有使用宋坑旧石而作的歙砚，就再也见不到歙州砚风，只留得一派清一色的“歙石端样”了。

从唐宋到明清，中国砚有着明显的变化。其轨迹是沿着突出石材质地美向追求雕琢美的途径而发展的，也即是从追求内在天然美，向着突出外表雕琢美的方向发展的。

买书为了读书，为了读懂书。藏砚亦为了读砚，读懂砚。但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读懂众多石砚的文化内涵，读懂中国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物化在石砚上的那些细微、精致的审美情趣，以及这些情趣演化的轨迹。



清乾隆庚子易铭端砚

宋、辽、金出土砚的砚铭

Inscriptions on Excavated Ink-stones of the Song, Liao and Jin Dynasties

撰文 / 华慈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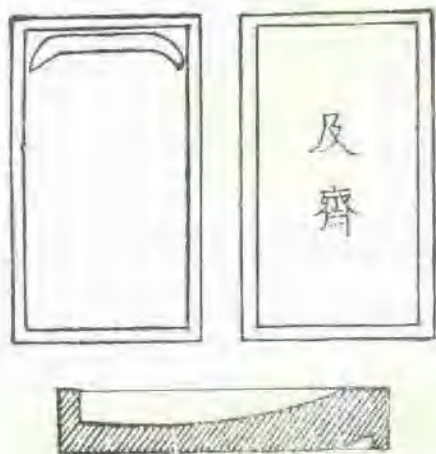


图1 浙江兰溪市南宋墓出土抄手砚

自古以来，砚是中国读书人的伴侣，在砚上镌刻自己的姓名、字号或标识，进而在砚上记录该砚的来源，对砚的开采、材质与形制加以描写和赞颂，甚至在砚铭中表达读书人对某事某物某人的认知、感悟，抒发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情操等等。这些砚铭的内容，是使用者在砚上的留言。而另一方面，砚作为书写的必备用具，又一直是当作商品而被售卖，故在砚上会有制作者的姓名（店号）、生产时间、地点，这些带有广告性质的文字以及一些吉祥用语，是砚的制作者在砚上的印记。

在不同的时期，砚铭的内容各有差异。本文收集了已正式发表的宋、辽、金时期出土砚的砚铭，加以分类、排比，从使用者和制作者两方面对砚铭作如下研究。

使用者的砚铭

使用者的铭刻内容一般为自己的姓名或字号、对砚的称颂，以及其他一些文字。

1. 使用者的姓名、字号

河南上蔡宋墓出土一件北宋晚期的澄泥砚，底竖刻“李伴叔”三字。河南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出土有抄手陶砚，质地细腻，砚底刻有“马文”二字，字迹潦草。“李伴叔”与“马文”应该是砚主人的姓名。浙江兰溪市南宋墓出土一件抄手砚（质地未明），砚底中间刻有“及斋”两字（图1），可能是主人的斋名，此墓同出有笔架、水盂。由于在石或陶上刻字不如在纸上书写这般容易，所以，某些使用者只刻一个字，或是姓，或是名，或是字，或是别的符号。如内蒙古敖汉旗大横沟辽代早期墓出土一件陶箕形砚（图2），底部中间刻画一个“王”字。此砚制作工整，底部有四锥足，砚首上还有一孔可用来插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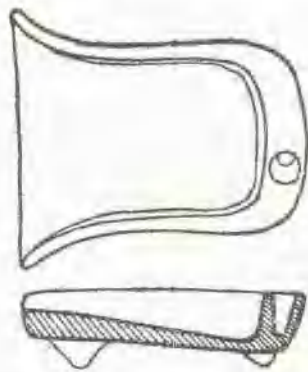


图2 内蒙古敖汉旗大横沟辽代早期墓出土陶箕形砚

2. 称颂之言

使用者在砚上铭刻称颂之言的见有一例。浙江诸暨南宋董康嗣夫妇墓出土一件端砚，砚面呈